

刘焱
◎ 著

中国封建帝制下的

官制沿革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朝代更迭，王旗变幻，一朝天子一朝臣，不改是皇权世袭家天下那锅老汤。
官制沿革，君臣佐使，监察刑罚与贬谪，依旧是自弹自唱自鼓掌那副黄腔。



刘焱
◎ 著

中国封建帝制下的

官制沿革

D691.42

2092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封建帝制下的官制沿袭/刘焱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034-2861-6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官制—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2903 号

责任编辑: 梁 洁

封面设计: 亚细安平面设计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录 排: 北京步步赢图文制作中心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24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数: 360 千字

印 张: 5 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中国封建帝制的官制及官文化，是一个庞大而繁复的系统。这一系统在相当程度上自成自闭，却又具备极强的内部开放性，其鲜明的独特性一直保持到帝制终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封建官制或蜗行或奔驰地显现其文化张力，辐射到中国人社会生活及政治实践的诸多方面。无论这一文化系统对塑成我们的民族性格曾经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对育成我们的社会结构、行政方式、人际交往准则乃至思维模式有多大的影响，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找寻她在当代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遗留踪迹或文化背影，无须我们费太大的劲。

譬如：哪怕仅有三五个人组建的公司里的一次会议；即便冠之以“朋友”、“同学”、“老乡”聚会的一场饭局。身份、级别、权势、地位、穷富……等等差异，都是不难找出必须特别讲究的理由的。而且，认同、接受、尊重和习惯于这些差异，自觉地回避因抵触规矩或触碰文化禁忌而造成的面子尴尬、气氛紧张和人际冲突，是对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最基本的文化要求。对于这种文化迹象，蛮横地指责或苛求速变，恐怕本身就会被指责为蛮横和有违公允。

作为身处其间、且有文化使命感的中国人的文化责任之一，是对此进行掘根式的文化思考、反省以及清洗、晾晒。这也是本书最基本的写作意图。

近年来渐兴的所谓“国学热”，以本书作者的视野，既非传统文化的“复兴”，亦非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振兴”。而是一部分有文化使命感的中国人的文化危机感和创新紧迫感的显现方式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巨人姿态的愈见显现，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文化面貌、文化素养、文化





品位也急需改善和提升。我们决不能、也绝不应该以一个腰缠万贯却土头土脑的乡下财东的面貌站立起来，更不能满身的绫罗绸缎兼珠光宝气，却散发着陈年的汗馊味儿和酸腐气步入文明的殿堂！

抖落尽历史留下的文化烟尘和由封建文化传统滋养出的文化虱虬，中国人应该以一种清新雅致而朝气蓬勃的、融汇包容且具创新活力、富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韵味的文化姿态，与世界各民族人民在进步的大道上前行、在文明的殿堂里聚会！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气质、文化品相和文化能力。

官文化丛书的第一部《中国封建帝制下的官场角色》已于2010年出版，内容主要围绕中国封建帝王政治体制下的两大类政治角色——君主和臣子，并分篇逐章地论述其在官场上的政治表演、权力属性和人格特征。

这次出版的《中国封建帝制下的官制沿革》是第二部，较为完整、清晰地描绘了一幅中国封建官制从萌芽、产生、确立以及演变的脉络图。并结合史实，尝试对中国封建官制下形成的一些奇特的现象进行剖析，并探究其文化根源。

即将出版的第三部《中国封建帝制下的官僚文化》，对封建官制中的谋官之略、做官之诀、保官之要、升官之秘，予以尝试性的揭示。对封建官制的三大制度核心，即世袭制、终身制、委任制，以及由官本位政治文化熏染成的国民奴性，予以剖析、揭露和批判。最后，就中国的封建官制及官本位文化与中国历史周期律以及历史上的改革与革命的关系，做一些尝试性的探究。

本书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原新疆昌吉电大校长马金勇同志、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杨河、张武军等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奉上真诚的谢意！同时，由于本人学识水平和参阅文献的有限，本书中必有一些缺漏和不足，还望读者予以慷慨的谅解，并给予善良的批评指正。

刘炎

2010年12月21日于新疆昌吉后乐书屋

序 言	001
第一章 官的萌芽和发展	001
第一节 历史耶？官吏耶？	001
何以为官？/ 二十四史俱为“官吏”/ 何以民不入国史？/ 中国人的历史感/ 修史由官不由民	
第二节 官的萌芽及产生	011
猴子打架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 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官 / 官与官僚体系——人创造的社会秩序工具	
第三节 官的职能及演变	020
五千年来最受尊敬和崇拜的人物 / 黄帝王朝是一个精简的能人政府 / 舜帝的丰功伟绩	
第二章 封建官制的建立及演变	027
第一节 何为封建官制？	027
“封”与“建”/ “庶人”与“贵族”的两级社会 / 封建官制——专制主义官制的典型 / “顺民”与“暴民”的两极选择	





第二节 封建官制的建立 034

“天子制”与中国人的官制之祖——黄帝 / “禅让制”与千古圣君“尧”、“舜” / “宗法继承制”的利与弊 / 封建制、宗法制、礼乐制的扬弃者——秦始皇 / “爵位制”——刘邦制作的又一封建拼盘 / “推举委任制”——封建官制的核心内容之一 / 封建帝国的动力系统与操作系统

第三节 封建官制的演变 053

“凭才学当官”与“靠关系发家” / 养士之风与“察举征辟制” / “九品中正制”及其影响 / 世族与寒门并行的“门第等级制” / 始于隋唐的“科举取士” / 元朝民族歧视政策下的“臭老九” / 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

第三章 封建官职体系——文官与武官 074

第一节 历代建制及文官体系 074

先秦时期的官职设置 / 秦朝的地方郡县制 / 汉代的“三公九卿制” / 三国至魏晋时期官制的变革 / 隋唐的“三省六部制” / 宋代的“行政、军政、财政”三权分立 / 元朝的“行省制” / 明朝绝对专制的中央集权 / 清朝的官职、官署

第二节 兵制演进及武官体系 120

夏启建立由天子直接控制的常备武装力量 / 西周时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 硝烟四起的东周列国时代 / 秦帝国的崛起和秦兵团的神话 / 汉代的“募兵制”与“郡县兵制” / 三国时期以“世兵制”为核心 /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开府将军制”与“府兵制” / 大唐时期“募兵制”的再度兴盛 / 北宋的“兵权三分

制”及王安石变法 / 辽帝国与金帝国的兵制 / 铁木真与忽必烈时代的无敌蒙古军团 / 明朝军队的“卫所制” / 清八旗兵的军事神话 / 刺入大清王朝心脏的匕首——“新军”

第三节 文官与武官的相互关系 171

农耕文明与文武之道 / 文官的教化安民和武官的武装除暴 / 从廉颇、蔺相如的“将相和”到岳飞、秦桧的“你死我活” / 从“文治武功”到“重文轻武、以文抑武”

第四章 官员的俸禄、待遇与特权 187

第一节 俸禄——官以食为天 187

叔齐、伯夷虽不食“周粟”，但却不忘采“薇”充饥 / 以“石”为核计单位的秦汉时期的俸禄 / 九品中正制之后官员的俸禄 / 盛唐是官员们腰包振衣作响的时代 / 啰唆繁杂得能让人背过气去的宋朝官俸 / 受大宋皇朝影响的辽、金、元时期的官俸 / 朱元璋大约是想让“弟兄们”不要忘却过去的苦日子 /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 低薪“保廉”与高薪“养廉”

第二节 待遇——臣以君为父 217

《史记》中记录的第一位亿万富翁——范蠡 / 经济待遇的高低悬殊：衣、食、住、行与玉 / 政治待遇的高低悬殊：“治人”与“治于人”

第三节 特权——法以王为度 231

“人治”是孕育特权的政治温床 / 特权也不外乎当权者“法外开恩” / 特权魅影——《水浒传》 / “跋扈将军”的极至特权 / “潜规则”——成定式的隐性特权





第五章 官员的监督、刑罚与贬谪 250

第一节 封建官职的监督、考绩、制约系统 250

先秦时期的监察官 / 监察系统大发展的时期——秦汉 / 隋朝的监察机构 / 唐朝的台院、殿院、察院 / 最注重权力钳制的赵宋皇朝 / 元朝的“一司”、“一院”及“肃政廉访司” / 明清时期的都察院、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 / 历代对任职官员的考绩制度 / 古代中国的审计制度 / 作为行政规令制约的铨选制度 / 与铨选制度相对应的回避制度

第二节 刑亦上大夫——做官的风险 285

舜是第一个为中国人立法定刑的帝王 / 受刑的君主和文臣武将数不胜数 / 中国古代刑罚之惨烈 / “伴君如伴虎”

第三节 贬谪——文化人精神创造的内迫力 307

假如孔子一直仕途坦荡地从政为官 / 理想主义干不过功利主义 / 屈原之苦，是有大才学、大道德人之孤愤苦 / 汉代的四大苦才子：司马迁、董仲舒、班固、王充 /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仙李白 / “独立苍茫自咏诗”的诗圣杜甫 / 江州司马青衫湿 / “唐宋八大家”的坎坷仕途 / 史学巨子司马光和理学大家朱熹 / “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 / 封建时代的贬谪算怎么一回事儿

参考文献 343

第一章 官的萌芽和发展

第一节 历史耶？官吏耶？

何以为官？

《说文》对“官”字解释曰：“吏事君也。从宀（音棉）。”“宀”是覆盖的意思。“宀”下面的那一部分是众的意思。把众多的人都覆盖住，那便是“官”。《礼记·王制》里有“任官然后爵之”的句子。强调了官是需要“任”的。而且还要任出个等级（爵）来。这倒和《现代汉语词典》多少有些对卯。《礼记·王藻》的“注”里说：“官，谓朝廷治事之处也。”这里的官又成了官府指称。看来，区区几笔写就的一个“官”字，还真有点儿难解释、费琢磨哩！把词书翻来翻去，后来经搔首苦思，方始渐渐悟出下面两条“心得”。自忖大致是错不到哪里去的……

第一，“官”是必须在政府机关、军队或某个组织内担任一定职务，负一定责任，有权说一些话，做一些决定或事情，并由此享受一定待遇或特权的人。官的下面必须有一些人听他的话，按照他的口令或指示行事，并对他“尊”而“从”之。自己待在家里想入非非、对着镜子称孤道寡，面对墙壁或沙发，甚至老婆儿子，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甚至以强力逼迫人家向您下跪请安、叩头请罪、山呼万岁……都是无以为“官”的。一句话，官不仅是一个职位或一把交椅，关键在于没有这个职位或交椅的人，对这个职位或交椅，以及坐在上面的屁股的认可。

第二，按照现代的中国人编撰的，教育小学生学文化的词典的解释，官似





乎应该是个古老的、陈旧的东西。如若不然，现代的学问家们干吗要把“官”“旧指”呢？更何况现在的中国，人民已翻身半个多世纪，当了近60年家又找了近60年主，旧时的官大爷们，怎能不收起令旗，拆掉龙辇或绿呢大轿，将官服改作老衣，凄凄然告别朝廷或衙门，惶惶然奔赴地府黄泉去矣。当然，政府和军队是必须要有的，自然也应该有相应的职位或交椅存在。坐在大殿上之人民，将这些职位或交椅，交给他们心目中忠诚并且优秀的代表。获此殊荣的代表们不诚惶诚恐、兢兢业业地当“公仆”，做“公务”，又做什么？

既然在今天的中国，“官”已被“干部”、“公仆”、“公务员”替代，原有意义上的“官”，尤其是旧版的《新华字典》解释的那种“官”，自然一个也找寻不着了；做官、升官的含义、企图和梦想，也只好到历史的故纸堆中去寻觅。好在我们的伟大先人们，为我们早已留下数不清的故纸堆。且不论佚文野史如何之浩，单单一部“二十四史”之浩繁、博大、晦涩、枯燥、艰深，就足够一个像我儿子那样的读书郎，毕其一生之功去咀嚼和品味。

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对斯诺谈起他年少时读《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闲书”、“杂书”时的感想：“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经过思考后，他悟出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呜呼！人民救星年少时的见识，迟至今日方才望其项背，不由得再呼一声万岁！

二十四史俱为“官史”

沿着救星的感悟和思路去读“二十四史”，便有八八六十四史也豁然开通了。盖“二十四史”俱为“官史”矣！先从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读起吧。

司马迁著一百三十卷史书，自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至留存下来的七十《列传》，成为后来史学家记述国史的表率：有开国立朝之功的大王天子，或者被认为文治武功兼备的皇帝老儿，甚至曾经一时掌握了实权的皇帝老婆（譬如刘邦的老婆吕雉），他们的丰功伟绩，是要记述在《本纪》之中，方显出帝王之气的。

地位逊于天子的王公贵族、割据地方的诸侯甚至扯旗造反、称孤一时的豪杰强梁（如陈胜），则以《世家》来彰显他们的与众不同。

至于文治卓著、武功显赫的文臣武将，至少也能排上一个《列传》或《传》以留名万世。哪里找得到一个农夫老大的影子？

古人云：“食色性也。”就算司马迁先生被汉武帝刘彻强行去了一个“色”字，但他总还是要吃饭的吧？总还是晓得他老人家的盘中餐出自何人之手吧？却为何洋洋“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太史公自序》），都不舍得为衣食父母留只言片语？当然，这样反诘司马迁，并不是对他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修史德操的怀疑。仅从他能只身力排众议，敢于捋汉武帝的虎须，为兵败被俘的李陵说几句公道话这一点看，恐怕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少人有资格对他老人家的道德情操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到了宋代，司马光先生重新捡起了春秋时代按年代记述历史的手法，编写了一部《资治通鉴》，浩浩荡荡百余万文字大军一字排开，叙述的史实似乎更加详尽，同时也显得更加枯燥。但我们依然很难找到几千年来生生不息，以勤劳、善良、踏实、苦干、忍耐、本分著称于世的中国农民的身影。

也许有学者模样的人说：谬矣！谬矣！陈胜不为农民乎？李自成不为农民乎？司马迁先生和张廷玉先生，不是分别赐给了他们《世家》和《传》吗？惭愧！的确，在中国五千年以农民为主体人口的历史进程中，陈胜与他的战友吴广，以及李自成与他的兄弟兼敌人张献忠，恐怕是最最幸运的四位农夫老大了。因为司马迁和张廷玉不可磨灭的史学功绩，让他们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留下了姓名。然而，使他们成为家喻户晓的，在一部分民众心目中被当做“农民英雄”看的，却绝非司马迁和张廷玉！

《史记》之《陈涉世家》记载：“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通佣）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又载：陈胜称王后，“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即拉扯起与陈胜当年的老关系），乃置（释放），不肯为通（通禀、通报）。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夥，音火，楚人谓多为夥。颐是语气助词。夥颐是惊叹陈胜当了王之后，宫殿帷帐庶物之多）！涉之为王沈沈（谓宫室之深邃、幽冥中透露着威严）者！’……客出入愈益发舒（张狂、放肆），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通专）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

《明史》之《李自成传》说：“李自成，……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及长，充银川驿卒。善骑射，斗狠无赖，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之，将置诸死，脱去为屠。……崇祯元年（1628），陕西大饥，……有安塞马贼高迎祥者，自成舅也，与饥民王大梁聚众应之。迎祥自称闯王，……四年，……自成乃与兄子过（即李过）往从迎祥。”而且还说：“自成为人高颧深幽，鸱（音吃，一种猛禽，





民间又称鸱子)目曷(当为鸱,音何,一种产自晋、冀北部的善斗的禽类,又称褐马鸡)鼻,声如豺。性猜忍,日斫(音浊,砍)人斩足剖心为戏。”

由上述司马迁和张廷玉留给我们的这些文字,我们恐怕只能得到如下的“农民英雄”形象:

第一,陈胜对他的农民身份和耕种职业并不热爱,而是“怅恨久之”的。他“怅恨”的对象,倒未必只是“剥削”了他的老板,很有可能包括他的那个不能给他带来“富贵”的职业。

第二,“辍耕之垄上”的陈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普通农民兄弟那样,利用田间休息的短暂空闲,缓一口气、喝一口水、啃一口干粮、抽一袋烟……充其量再想一想下一步该干哪些活计,憧憬一下年末的收成和来年的光景。陈胜有他更远大的人生理想:“富”而且“贵”!一句话:摆脱他枯燥、繁重的职业劳动和他所隶属的贫贱阶级!

第三,陈胜打心眼里就看不起与他一起“佣耕”的本阶级兄弟,与他们也缺乏同为“佣耕”的阶级情感。因为他自己是志大才高的“鸿鹄”,而弟兄们不过是不值一晒的“燕雀”罢了。虽然他曾有过“苟富贵,无相忘”的承诺,但大泽乡之变后身为“张楚”王,显然已经“富贵”起来了的他,面对前来寻求“无相忘”的“佣耕”故友,陈胜并没有与他们共享富贵,而是嫌他们不懂得斯文体面,碍手碍脚,掀了他的底牌,丢了他的人,于是,悻悻然斩杀之!

再看李自成,他虽然没有种过田,但放羊的出身,用今天的话来讲,应该算是牧民。后来从事过邮差和屠夫的职业,倒的确出的全是苦力,干的全是脏活。但在张廷玉的笔下,李自成偏就生得一副豺狼样狰狞的嘴脸,且性情猜忌残忍、好勇斗狠,屡犯国法,起事前为一戴罪待斩而侥幸越狱逃脱之死囚。拉起竿子后,又每天把杀人砍脚挖心当作游戏。

我们实实在在从司马迁先生和张廷玉先生的笔墨中,既看不出这两位农民的勤劳,也看不出善良,更看不出中国农民的踏实与本分!

翻开浩荡如潮的中国历史档案,我们通常只能在两处观看到作为中国人口主体的农民的历史身影:饥饿和造反!而对耕种的辛劳和收获的喜悦,却几乎找不到多少醒目的墨迹。司马迁的《史记》如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如是,所谓“二十五史”,竟然史史如是焉……难怪梁启超先生曰:“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中国之旧史》)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人所作的“历史”,何以会是这样一副面孔?

何以民不入国史？

在此反复提及农民，不仅仅因为农民是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今天依然是中国人口的主体，而是因为自黄帝王朝始，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官”与“民”始终是一一对立统一的范畴。尤其是对立的一面，往往在使用和理解上更为凸显。在《新编多功能学生辞典》中，甚至是把“民”作为“官”的“对立词”，抑或“反义词”来理解和使用的。譬如“官逼民反”这个成语中的“官”和“民”，就是在这种含义下被理解和使用的，以至于很容易让我们忘记它们统一的一面。而农民正是中国的“民”中，最多、最大的一群。封建社会“官”与“民”的对立，当然主要是官与农民的对立。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地有所谓的“农民起义”，而几乎没有“工民”起义、“商民”起义，也说明这是基本的史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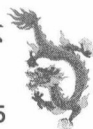
中国封建制度下的民，大致分为四类：士、农、工、商。

“士”在周代原是介于大夫（也就是官僚和贵族）和庶民之间的阶层，属于贵族的最末一个等级。其早期的主体是军人，称为武士。也有一些文人，即文士，但数量应不及武士多。这跟古代文化和教育的欠发达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士”是要直接做事的，故《说文》把“士”解释为：“士，事也。”

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百家争鸣”，掀起了中国人“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学文而会做“文事”的文士便多起来，终至成为“士”的主体。于是，《白虎通·爵》对“士”的解释就成了“通古今，辩然不，谓之士。”《汉书·食货志第四》曰：“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算是把士、农、工、商四民都解释清楚了。后来称为“士大夫”的，基本上都是读书人，今天的话叫“知识分子”。做“武事”的反倒不大被称为“士人”了。武士中产生了“分裂”，少数当上官的，被称为“将”、“帅”，多数没当上官的，则普遍被称为“兵”、“卒”。

古时候农、工、商的含义，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基本上没有什么出入。从士、农、工、商四民的排序上不难看得出，在“以农为本”，并且强调“重本抑末”的中国封建农耕文明社会形态下，农业的重要，和农民在“民”中的分量。虽然农排在了士之后，但毕竟要算“民”中的老二。况且，从人口的绝对数量和占人口的相对比例来看，农，无疑是中国人的老大！故，中国封建社会形态下“民”的主体是农民。而恰恰这个作为主体的农民，我们通过史书却了解的最少。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布衣匹夫之人，不





害于政，不妨百姓（实际上指百官），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这表明，司马迁虽然仅为这些“民”费了他一篇“列传”的刀笔工夫，但毕竟还是没有忘记“民”的。需要注意的是，他所言的“布衣匹夫之人”的民，是不包括“士”的。譬如孔夫子先生，由于后来被尊为圣人，就享受了《世家》的“历史待遇”。像司马迁本人，作为如此宏大的史学巨著的编撰者，专门为家族和自己开一扇历史的天窗，而且还以《自序》而非《列传》称，位置也排到了第“七十”，即最末的位置，不仅理所应当，也充分显示了某种谦逊。

然而，就在《货殖列传第六十九》，这篇本应述说农、工、商三类“布衣匹夫之人”的文字当中，我们依然没有见到有名有姓的农民，倒是见到了几个商贾富豪。因为司马迁认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司马迁先生简直就是神人，两千余年前，就有我们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见识！

何以民不入国史？尤其作为民之主体的农民，除了饥饿和造反这两桩哀号与血腥之事之外，再难现于国史，使得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国学大宝“二十四史”成为“官史”？

中华民族自远古时代起，就十分看重本民族甚至本家族的历史。世界上恐怕再难找出有中国人如此强烈的历史感的民族。这一点，从中国人保留了最为完整详尽的国史和最为齐全清晰的家史（族谱和家谱）就可以看出。这种历史的记述活动，不仅给中国人的子孙留下了堆积如山的历史文字，更重要的是，遗传给他们一种十分独特的个人、国家、民族三者之间的文化认同和心理同一。

中国人的历史感

下面两件事情，也许能让我们对中国人强烈的历史感，加深一些印象。

据《史记》第一百三卷《太史公自序》记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皇帝老儿封禅泰山，如此重大的国家大事，居然没有把身为太史的司马迁老爹带去，这便活活气死了他老人家。老人家声泪俱下给儿子的临终遗言，一半是对先祖的追念、对后人的期望和嘱托，另一半听起来简直有点像声嘶力竭的“威胁性”事业交代！子承父业，必须接老子的班，把老子没做完或想做而没做上的事儿一路做下去。一个“必”字，不由分说，也不容讨价还价！因为

这件事既关乎对祖先事业的“续”，也关乎对老爹的“孝”，是一件集“事亲”、“事君”、“立身”三者为一体的大事业，而且还关乎到“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身为人子的司马迁，面对老爹交代的关乎社稷兴衰，关乎光宗耀祖，关乎扬名后世，关乎“孝之大者”的历史使命，怎能不俯首流涕、诚惶诚恐？

呜呼！父子二人为了一个“史”字，一个被皇帝活活气煞，一个后来被汉武帝一刀废掉，此间辛酸泪水和血腥之气，怎能不令我们掩史长泣，潸然泪下！

《宋史》之《文天祥传》载：“天祥至潮阳，见弘范（元军元帅，姓张），左右命之拜，不拜，弘范遂以客礼见之，与俱入崖山，使为书招张世杰。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书所作《过零丁洋》与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个故事里的那两句诗，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烂熟于心的。文天祥的才干和气节，连他的死敌元世祖忽必烈都佩服于心。在忽必烈的帐下，文天祥不仅可以不死，甚至可以继续当宰相，前提当然是他得听忽必烈的话、受忽必烈的使唤。这种令某些人看来，连烧八代高香、打着探照灯都未必找得来的美事，文老先生却愣是把脑袋摇得拨浪鼓一般，宁可伸长了脖子去挨刀！何哉？“汗青”上留下他的“丹心”的血证，给后世子孙留以清名而非骂名。为了历史的记述和评判不留污迹，荣华富贵固然可以抛却，连身家性命也可以搭上，此等勇气和节操，缺乏严肃而且沉重的历史感的人，怎敢望其项背？！

由于对历史的看重，中国的史学家在抓取历史事件来填充历史框架时，就必然十分的谨慎而不轻露草率。这一历史框架，就是历史观，以及基于其上的对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自司马迁起，“二十五史”的编撰者，无一不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作为审视历史、人生、社会的眼镜和尺子。

在儒学祖师孔夫子先生看来，天底下最最重大也最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政治”，而非与吃饭、穿衣这类事情相关的“生产作业”活动。“克己复礼为仁”，可以说囊括了孔夫子政治理念的全部核心内容。“克己”是个人的道德实践准则；“为仁”是社会的政治实践准则；“复礼”则是全部人生目的和社会目的的最终精神指向。

孔子重视政治实践而轻视具体的生产实践，在《论语》第十三篇《子路》一文中有十分典型的陈述：“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迟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既然孔子都如是说，那么他老人家的徒子徒孙们又怎么会有兴趣，让樊迟这类一门心思扑在稼穡上的“小人”派出一些代表出现在严肃而重要的史书上





呢？小民们在政治上的权利，就只是对“上”的“敬”、“服”、“用情”而已，而且还是“莫敢不”的。因此，他们便不用也不配进入记述“上”是如何“好”“礼、义、信”的国史。故而，那些只是从事“礼、义、信”这类政治活动的“上”及其党徒们，频频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舞台上拍照，留下他们叩头作揖、握手拥抱、敬酒寒暄，甚至打嗝放屁的历史镜头，就实在不值得奇哉怪也了。于是乎，“二十五史”俨然一副高高在“上”的政治史的嘴脸、“官史”的腔调，就在情理之中。

修史由官不由民

修史工作在中国进入文明以来，历朝历代都是把它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活动来对待的，而非简单地看作学术活动。由于是政治活动，修史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官方的政府行为，而非可以由民间来做的个人行为。正唯如此，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所谓“正史”，从《尚书》到《史记》直到《清史稿》，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由官方委任的“史官”修撰的。这与《伊利亚特》和《奥德塞》，由一位双目失明的江湖流浪艺人荷马以诗歌的形式完成以及《希腊波斯战争史》由被迫流亡他乡的雅典公民希罗多德撰写——这一西方史学的传统，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人的这种官方修史的传统，本身就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生活的产物。

商代在中央政府设立了“太史”的官职，主管天文观测、星象占卜和祭祀活动。商代人崇拜祖先，由此也崇拜祖先灵魂所依附的鬼神。这种对祖先和鬼神的崇拜，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生活当然尤为如此。从官方的礼乐征伐到民间的婚丧嫁娶，商人都要通过占卜活动，向祖先和神灵请示。

这种占卜活动，是在神圣而隆重的祭祀典礼中进行的。包括观测天象、星象、宰牲、祭拜等一系列活动。最早的“太史”，是从事这方面活动的专家。占卜是从事上述活动的基本环节。占卜的结果，成为指导国家政治、军事等重大行动的指南。占卜的过程和内容，被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称为“卜辞”，成为记录这些重大活动的政治文献，也就是我们今天视为国宝的甲骨文。同时，也成为后代人最为珍贵的，崇拜并仿效前人从事政治活动的历史参考。于是，中国人开始有了最早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太史”一职，也就逐渐演变为真正的历史记录者——史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的史学，是起源于上古时代政治活动中的祭祀环节的。

官方委派官员修史，给中国人的史学带来的影响是重要而且深远的。本书重点强调的是以下四点：